

前言

本期共收錄三篇文章，分爲〈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楔子戰略」的研究〉、〈意識形態娛樂化 2.0：來自中國電影宣傳策略變化與影響的觀察〉與〈以聯合實驗法初探我國兵役制度組合的民意基礎〉，這三篇文章看似分別討論中國對太平洋島國的政策、中共的意識形態與宣傳政策，以及我國的兵役政策，但均反映了中國正在擴張的進行式與個別國家對這個既定傾向的反應與困境。

在〈中國在太平洋島國地區「楔子戰略」的研究〉一文中，作者發現中國近年在當地的外交施政同時反映出「選擇性迎合楔子戰略」與「對抗式楔子戰略」的特徵，試圖併用利誘和施壓手段裂解太平洋島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傳統連結。例如，經由援助與投資滿足島國需求、操作島國與美澳等國家間的積怨，以及對少數島國施壓等作法，成功促使數國和我國斷交，也使島國更敢於公開批判美澳。然而，其努力目前仍因受到多重因素制約而收效受限，因爲太平洋島國與美澳等西方民主國家關係至爲緊密，不僅長期接受各類援助，更共享悠遠的歷史記憶、民主價值、政治文化及頻密人口流動，也因爲太平洋島國基於殖民經驗與長期區域協調，建立起強烈自主意識及共同願景，表達樂於和各方合作、接受各國援助的同時，也高度重視維護島國集體作爲區域發展路徑主導者的定位，且中國與島國間看似友好的互動中仍潛藏諸多矛盾，例如部分島國接受中國援助投資的同時，對於本國會否因之捲入強權競爭一事深感憂慮。無論如何，印太民主國家有必要密切關注後續變化並加強應對，以防範其勢力持續深入當地而對區域安全環境造成負面影響。

在〈意識形態娛樂化 2.0：來自中國電影宣傳策略變化與影響的觀察〉一文中，作者蒐集 2008 年至 2022 年間共 665 部中國電影，

結合票房表現和編碼數據，系統性比較習近平與胡錦濤時期在電影治理政策、產品性質與內容特徵上的異同。作者發現，在市場化的背景下，習政權同時強化「攏絡」與「壓制」的作用，促使電影企業製作更符合民眾偏好的親威權商品。經由前述分析，作者提出「意識形態娛樂化 2.0」，說明黨國如何藉由非官方主體精進宣傳敘事與娛樂化包裝，進而提升大眾主動消費主旋律電影的意願。與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vist）等人提出的「意識形態娛樂化」不同處在於，「意識形態娛樂化」為胡錦濤時期到習近平第一任期的電影宣傳，試圖擺脫過度教條的風格，開始透過影視敘事、名導與明星號召等娛樂化包裝策略，軟化原本的硬宣傳。而「意識形態娛樂化 2.0」除更強調政治管控之外，同時也將宣揚場域從國家中心往社會方向伸展，透過中宣部重新統合宣傳聯盟，在既有的體制結構上進行策略性分工，將主旋律電影外包給民企製作，以多元所有制隱藏國家作為宣傳主體的身分。而習近平時期的電影治理與宣傳邏輯，亦與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改變相呼應。相較於過去偏重政治合法性與愛國主義動員，二十大後的文化治理更加強調歷史詮釋與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

在〈以聯合實驗法初探我國兵役制度組合的民意基礎〉一文中，作者以聯合分析問卷調查實驗法，探討民主國家如何在公眾意見與國防需求間尋求平衡，並以臺灣為案例。作者發現，受訪者傾向支持適度延長義務役期限，但對頻繁的教育訓練召集持保留態度，同時偏好在國防與社會福利支出間取得平衡。於次群體分析中，進一步發現不同性別、政黨偏好與中國威脅感知的受訪者在不同的政策特徵的偏好有所差異。對中國有相對高的威脅感知受訪者顯著反對將國防支出占比壓低至 20% 的政策選項，並且強烈肯定將國防提高至 80% 的政策級距。進一步來說，在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的背景下，臺灣能否維持具社會支持基礎的國防改革，成為其安全承諾可信度的重要條件。本文揭示受訪者雖然不願意國防對社福預算的比重極端的分布，但仍願意維持相對穩定國防對社福支出比重，這更進一步展示了受訪者對於

國家自我防衛決心的肯定。而這篇文章的政策啓示不在於提出單一的最佳政策方案，而在於指出國防改革的政治可行性必須建立在對民眾具體利害關係與政策取捨的理解之上。國家安全與外部威脅固然構成改革的重要背景，但若要將其轉化為對特定兵役或國防政策的穩定支持，政策溝通仍須回應民眾對政策負擔、義務分配與財政取捨的不同理解與可能疑慮。

最後，這三篇文章恰巧反映中國擴張的路徑，第一篇文章討論中國透過從外部對太平洋島國利誘施壓，以提升其影響力；而第二篇文章則強調中國如何透過意識形態的娛樂化將其價值觀鑲嵌在流行文化之中，藉此提升其影響力；第三篇文章雖僅止於討論臺灣，但仍反映著身處擴張陰影下的個別國家必須在有限資源、內部民意與外部安全壓力間求取平衡。這三篇文章的主題各異，但卻分別從「擴張國家」與「被影響國家」的兩端切入，回應印太地區中小型國家面臨的困境與難題。

《遠景基金會季刊》編輯部

